

美國與世界

李方譯



Philip W. Quigg
AMERICA THE DUTIFUL

5
F
6

H1
71- 抄
605

美國與世界

李方譯

AMERICA THE DUTIFUL: An Assessment of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by Philip W. Quigg. Copyright © 1971 by Philip W. Quig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73

美國與世界

原著者：菲立浦·奎格
翻譯者：李方

今日世界社出版

香港尖沙咀郵箱五二一七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印行

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封面設計：蔡浩泉
定價：港幣三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版

前言

曾經以美國大使身份駐莫斯科六年的湯浦遜 (Llewellyn Thompson)，有次講起一名俄國農民在寒夜裏騎馬馳過草原的故事。這個莊稼漢看見路邊有隻飢凍得半死的小鳥。他拾起小鳥，放到鞍上，伸掌烘牠，讓牠感到溫暖。他繼續馳騁，無意中發現前面有一堆新遺下的牛糞，還在雪地上冒着白氣。他趕緊把小鳥放進糞堆，自己騎着馬走了。小鳥受牛糞的熱氣一薰，又啄食糞堆裏的種籽，於是周身溫暖，飢餓盡除，不禁展喉高鳴。一頭狼聽見了，立刻跑來把牠吃掉。

這個故事跟人世間許多事情一樣，聽起來很不受用。不過，故事的本身倒有深刻的寓意，如果依照俄羅斯民族樣樣講究多的本性來說，實有三重寓意。第一：使你陷身其中（糞堆）的那個人，未必是你的敵人；第二：把你解脫出來的，未必是你的朋友；第三：陷身其中難以動彈的時候，千萬別鳴別唱。

這幾個寓意，全可以適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法國是我們交往最久的朋友，但它給我們的麻煩，

跟蘇聯給我們的一樣多。中共在五十年代本來已有重大的進步，只因毛澤東過於固執，以致一切進步在以後的十年裏，被毀壞到蕩然無存，結果也許反使我們在亞洲除了嚙受既有的苦頭外，少受許多苦楚。現在我們陷身越南，難以動彈，如果有誰敢出來鳴唱，如果有誰敢放胆說美國並不是一直沒辦法，不是一直妄自尊大，不是一直以救世主自命，不是一直帝國主義成性，也不是不道德的話，那麼，他在一羣青年人、知識分子、和覺醒的美國人士所組成的狼羣面前，就有被噬吞的危險。別人會罵他是在寫辯白書，是替現狀辯護，是輕信了一個腐敗和不老實的政府的宣傳。

不過，這種危險不是值得一冒的。假若爲了在越南吃過大虧而就毀掉我們的平衡感，假若讓我們目前心神迷亂的狀態影響到我們未來的決定，那麼我們對於自身的利益和責任，俱將無法辨認。罪疚之感，是行動（或不行動）的最壞動機。今天只要有人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合理的批評，立刻被「正式認錯」（*Mea culpa*）的喊聲打下去，整個世代耳濡目染之後，也就相信美國自從施行馬歇爾計劃以來，其所作所爲，沒有一樣不是可鄙的。車載斗量的評論家不問我們的動機，而只知肆加譴斥。借用作家李奧納的一句話：美國正在挖空自己的靈魂。

因爲美國內政外交千瘡百孔，所以一個人很容易變成不辨是非而終於徒知破壞的批評家。本來，在一個並非完全理想的世界上，縱使是作事後的檢討，也難於替過去的事情代籌一個更妥善的處理辦法，至於用心探求當時爲什麼要那樣做，同樣是困難的。還有，批評容易，但要替一件充其量也不外是無善無過的事情辯護，可就難了。知識分子的特徵是善疑，而善疑，正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樂趣。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聆聽批評的人可要記住，批評家說我們的作爲全盤皆錯，和政府官員說我們

的作爲全盤皆對，都是有質疑的餘地的。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爲批評者無責任，說錯了不必受過，而且至少在當前的環境下，也不會因其一己的看法不對，而對本身有任何損害。批評者只是隨波逐流。事實上，他的言論越偏激，越可引人注意，「麥克伯德」（MacBird）一書的作者把美國總統描寫成一名刺客而大受注視，就是一例。我們之中，有一部分是什麼都不聽信，或什麼都肯聽信，胥視發言者是誰而定。我們的善疑，已經磨利到變成一件有破壞性的武器。

因此，本書不是獻給專家，不是獻給居於多數的「沉默」的美國人，更不是獻給那批越來越居於少數的覺得自己的國家超人一等的美國人。反之，本書要獻給另一部分居於少數的人士，或者說得更明確點，獻給這一部分少數人士中仍願意聽一聽的人。這批少數人士，也就是一向相信美國「侵略成性，欠缺原則，沒有本領，或不宜負起世界責任」的人。

本書也不是獻給但求血腥革命的人，而是獻給那批願意相信在現行制度下仍可能實施變革的革新派和反對派人士。本書的用意，在於把善疑的程度畧爲減低，在於指出我們在全球的表現，並不是像一般所說的那麼幼稚自負，也在於把當前一些評論導入更有益的途徑。作者不是要對特定的政策或事件，提出完全客觀的分析，而是要大家多想一想我們外交政策進退兩難的處境。作者要跟當前被美國一部分——而且還是重要的一部分——人士奉爲金科玉律的評論，辯駁出一個是非來。

讀者一定注意到本書很少提到美國領袖的名字，因爲杜魯門、杜勒斯、甘迺迪、魯斯克、詹遜等姓名一出現，立刻就使人產生某些反應，致而阻礙清新的思路。每一個名字都勾劃出一個固定不變的形象，致而把真相變得特別簡單。詹遜在五十年代是反對美國捲入越局的領導人；魯斯克一度是主張

加強聯合國最力的人，（雖則到了後來，他多半把聯合國撇在一旁）；新上台的政府所施的許多新政，其實都是前一任政府開始的。艾森豪是受人敬仰的將領，在他出任總統期間，軍費支出減少；甘迺迪是戰後歷任總統中最易通過青年人和開明知識分子關卡的人物，但在他任內，國防預算反而銳增。

儘量不寫出政治人物姓名的另一原因，是本書認為美國政策的廢續性，比政府內部或領袖個人間的歧見，更重要得多。這並不是因為像一般人所說的，領袖是受了「制度」的困束，而是因為每一位總統和每一任國務卿所處的客觀形勢，都使他受到限制，使他不能選擇別的途徑，而限制力之大，則超過他自己的想像。正如政論家福蘭克所說：「最困難的政治問題，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人類學方面的。這一類的問題，並不是『制度』的產品。」

有的讀者看了本書的開頭幾章，覺得它太欠缺批評的氣氛，但別忙，請繼續看下去，就有發洩的機會了。不過，出發點跟我不相同的讀者，必須有「已見未必對」的極大氣量，才看得下去。

菲立浦·W·奎格

一九七〇年六月誌於紐約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目錄

前言

時間、地點、人物

無能的傲慢

我們反共過分嗎？

談反對革命與支持右派

承諾與干涉

何謂國家利益？

經濟控制世界

經援的問題

兩大難題

權力機構

公平的評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 時間、地點、人物

一位極有名的已故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家寫了下面的一段話：

全力狂熱應付國外紛爭的工作，在本國（指美國）已發展到跟重工業一樣的可觀。

難道我們在內政方面已經效率極高或大有成就，所以有資格教他國怎樣管理其國內的經濟嗎？我們是否具備所需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以決定他國的制度，使之合於我們的偏好呢？

上蒼並未規定歐亞兩洲的命運須由美國來掌握；唯有妄自尊大、迷於榮華、空自想像、貪圖權勢或者爲了規避國內的危機與對內應負的義務，我們才有可能把自己看做是上蒼的選民，要我們去進行綏靖全球的工作。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上面這段話是二次大戰爆發前不久寫的，那時美國快要結束其二十年的孤

立，大多數美國人開始第一次認清歐洲戰爭所以迫於眉睫，多半是美國沒有建立集體安全體系有以致之。另一點堪以注意的是，這段話正是本世紀一位極受人欽仰和極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查爾斯·畢爾德（Charles A. Beard）寫的。原文載於一本薄薄的題爲「浮躁與外爭」的書裏。

並不是說畢爾德在一九三九年寫的這段話看來有點可笑，而就認爲今天一些人所提出的相似批評，也是錯誤的。不過，這段話確有助於估評當代的言論。一個社會每到非常時期，尤其是到了極須重新檢討一切公認的真理之時，要進行合理的探討，是最困難的。打第二次大戰的那一代人，從小在教養上就相信戰爭是萬惡之首。第一次大戰經已證明戰爭既不能成事，亦不能保事物於不失，因此，不管產生那一種情勢，都認爲回到戰場總是不對的。從捷克首次被侵犯起，以迄訂立慕尼黑協定和德軍閃電襲擊波蘭和荷比盧止，其間的經過，都使今天四十多和五十幾歲的美國人在當時嘗盡質疑的痛苦。那時種種假設被提出來重新檢討，有人主張「美國第一」，有人決心「援助英國」，「美國國內意見的分歧，跟今天爲了越南問題而意見互異，正是一樣的情形。不是親嘗的教訓，是難於汲取的。當代的美國負責人物如果不再相信戰爭是萬惡之首，也不外是因爲他們曾經親眼見過更醜惡的事情，如納粹德國之消滅猶太人，蘇聯之清除反「斯大林化」派分子等等。親歷的經驗自然未必是良師，不過效力却很大。不管好歹，美國的外交政策直到今天爲止，始終是受過去的教訓影响的。這些教訓就是：姑息絕無好報；準備不足必然導致戰爭；唯有堅強承諾的集體安全制度可以達成和平；昔日的列強已經沒落，美國必須負起世界責任；蘇聯是擴張主義者，是侵略的，對外敵視的。

這些假定以及其他的假定，都在二十年前或更早之時訂下，其本質既無「權利慾」之存在，也不

是定要惡毒反共，但它們就是美國政策的要素，甚至今天仍是如此。如果認為舊日的「教訓」不足為憑，那也不免失於魯莽。過去的教訓可憑亦不可憑，而可憑與不可憑的程度也不一。不過，可不能漠視它們，尤其是民主國家更不能漠視，因為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是需要人民支持的。

上述的這些假定，也不是美國人自己空想出來的；美國的盟邦多半具有同感。筆者寫到這裏時，突然接到前挪威外長藍治的噩耗。藍治出長挪威外交部達二十年。他是社會主義者兼和平主義者，其父曾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金，他自己曾於戰後連續數年努力調解蘇美間的不和。可是到一九四九年，他終於相信蘇聯是不會妥協的，同時看到捷國被併入蘇聯集團，心裏更加難過，因此不得不主張一向中立的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也就在畢爾德申斥美國全力狂熱應付國外紛爭的前後，一羣跟他同樣名聞於世的美歐知識分子正聚會一堂，商談歐洲戰雲密佈的可能發展。其中七人於一九四〇年（那時歐戰已經發生）聯名發表了一篇情文並茂的文件，主張建立「美國主持下的和平」，以使全人類受益。這七人中有政治家紐布爾，學者孟福德等。下面是這篇文件的片斷：

今天其實只有這個國家（指美國）獨自負起人類的責任。……古今智慧在這裏——也只有在這裏——繼續生存。英國文化精髓在這裏受到保護，正如希臘文化以前在羅馬受到保護。

全人類的文化和精華也在這裏受到保護。這裏就是歐洲，世上幾乎再尋不出這樣的地方了。

這裏是保全「人類的一切」和「拯救一切」的歐美……美國聽到自己有領導各國的必要，真

是惶恐莫可言狀。它固有的優美生活和超然的立場，將大部喪失。不過這種必要已經迫於眉睫。當然，領導一詞含有絕對主權的意義。然而帝國主義跟絕對主權是有分別的。基於權慾而自居第一者，與基於歷史的客觀環境而被選為第一者，也是有分別的，因為前者是強權，後者是服務，是職責。因服務而握權，才是被選者的本質。

這種話在今天聽來，多麼有古者之風！可是當年在這份文件上簽名的人，有幾位今天竟完全不同意這種論調了。不過，不管你如何跟這批簽名人爭辯，他們有一點是絕對正確的，那就是歐洲列強以前所負擔的責任，在那個時期除了美國外，沒有任何一國可以出來承接。

在美國外交界服務了四十年的蘇聯問題專家鮑倫（Charles Bohlen）認定我們由戰後開始負起的全球性責任，是必要的和無法逃避的。他對於我們在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初期所建立的共同安全體系，曾發表如下的評論：

這不是有預謀的行動，甚至不是有意的行動。這當然不是爲了美國物質上的需要而出此。美國用不着再擴大領土。美國光靠正常的貿易，就可以滿足本身的需要。這當然也不是爲美國有什麼野心或什麼想頭。這只是美國對於一種外界形勢的反應，而這種外界形勢，是二次大戰的結果。美國如果不出來應付，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顯將遭受極權的蹂躪。這種行動固然跟自己的利益有一點關係，但我認爲更大的因素，是對於文明世界具有責任感，而當時

的情形，確是如此。他國過去的外交政策純以本身的物質利益爲出發點，而我們的政策則否，因此要對外解釋我們的政策，確實是困難的，過去如此，今日尤然。

這一段話，同樣帶着古老的意味，尤其是認爲美國行動的出發點是責任感，而不是純粹的國家利益。美國的一位總統有次在天主教大學裏，也談到我們「深遠自發的道義責任源泉。」這一類的話，正是評論家所難以容忍的，而評論家的憤怒，也非毫無理由。不過，這種論調的本質，可不啻一筆抹煞。我們的「責任感」曾經使人類受益；我們不以舊社會嫉世憤俗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我們希望這個世界變好！這一切使我們在他人袖手旁觀之際，決心介入，甚至遇到我們不該介入的地區，也一樣介入。介入和承諾，在人與人間的場合，本來是公認的美德，然則在國際間的場合，爲什麼就該予以譴責呢？

我們這個社會到處有矛盾。最憎種族優劣論的人，却時時斷定某一民族是天生的邪惡民族。孜孜不倦爲自己爭權的一批美國人，却希望美國本身的權力越少越好。以「後果難料」爲理由而反對我們捲入國外事務的人，却想不到我們假若不捲入的話，後果又將如何。開口閉口不離意識形態的人，却不准美國國內探討意識形態問題。其他矛盾，更是多到說不盡。甚至我們所使用的標誌，都是矛盾的，結果弄到兩代間的鴻溝更加深巨：邱吉爾伸兩指作V形，原是舉世所知的「勝利標誌」，但今天却成爲和平——人人欲求而迄未獲得的和平——的標誌。

因爲美國人是從那麼多的前提來立論，所以大家一交談，就覺得彼此是文不對題。想從美國過去

廿五年的作爲中尋出一點功績的人，根本難於與觀點相反的人交談。每一方都認爲對方完全沒有客觀感。走極端的貶者一多，褒者也就退而探究美國決策者的動機爲什麼一直那麼壞，而其他的人的動機又假定那麼好。

不過，抨擊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可以分爲兩大派。第一派始終認爲美國一開頭就是擴張主義者，就是巧取強奪，就是一切以商業利益爲主，而一切作爲均基於一種幻想，以爲凡是對美國有益的東西，也必然對世界有益。我們跟這一派人士，實在沒有談論的餘地，因爲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切原有的價值和傳統外，我們不管做什麼，都是被罵爲貪婪的，帝國主義性的。可是這一派的論調，却深深地影响了即將成年的下一代。許多最聰明最活躍的美國學生現在也相信美國的對外關係，沒有一次是使美國與對方同受其惠的，除了對美國商業或狹義的國家安全有所輔助外，對任何人都無利的。

第二派認爲戰後的美國在馬歇爾計劃終了前的那一段期間，其一切作爲尙具仁義之風，也還能顧到本身的真正利益，雖則一提起共產主義的危險，就不免誇大兼發生判斷上的錯誤。可是從那個時期之後，美國就背棄本身的理想，採取強硬、高壓、和唯權是爭的政策，致而喪失其過去所應得的尊敬了。碰到這一派人士，一個意見與之不同的人還可以跟他們作合理的談論，可以一面同意他們所提出的某些觀點，另一面說服他們，使他們承認權與責是相聯而生的，問題是怎樣把「責」的範圍，作一個更明確的劃分，又怎樣更有效去履行責任，而不是逃避責任。

評論者和維護者的基本歧見，有一部分是起因於彼此的世界觀不同，而對於我們究有多少力量來影响世界，也彼此看法有異。本書的大前提之一，是認定我們都住在一個危險的世界裏，縱有片面裁

軍和撤軍等類行動，也不會減輕它的危險性。自一九四五年以來，規模龐大到足夠稱爲「戰爭」的軍事衝突，已有五十四次。很清楚的一點是，其中只有少數的幾次是有大國參加的，因之，我們可以大胆的假定，縱使沒有美蘇兩國的存在，縱使沒有核子武器，這個世界一樣是危險的。甚至可以說，假若沒有超級大國的存在，危險性可能反而增加，因爲超級大國會經或多或少把一些軍事衝突的殘暴性，力予制止。儘管如此，聯合國的估計數字仍證明蘇丹的一次內戰，就會經殺死了五十多萬蘇丹人，而世界上根本很少人知道有這次內戰，知道的也漠不關心。一九六六年十月間共黨奪政失敗所引起的一場屠殺，也曾死人三十萬。還有，奈及利亞北部的伊波斯族在短短幾天內，就被殺三萬人，跟着又發生一場內戰，喪生者究有多少，這一代恐怕是沒法知道了。這幾次事件都跟美國沒有一點關係；作者在這裏提出來，只欲證明一般人所說的「人性本善唯權力不仁」一語，未必能令人信服。

本書的另一前提是，美國內政與外交交織之密，比任何時期更甚。關於這一點，不同意的人很少。內政外交有時根本分不開。越戰引起美國國內的暴力行爲並使人覺得這種暴力應用得當，還是其次的問題。從久遠的觀點去看，更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爲應付內政而採取的方式，將大部分決定我們外交的效能。原來全世界今天正密切注視我們，原因不但是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許多人，同時我們之所爲或所不爲，都逃不過世人的眼目。其次，別人用以判斷我們的標準，跟他們用以判斷我們敵手的標準，是不同的。別人要看我們說過的話，究竟履行了多少，或沒有履行的又有多少。因之，我們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失敗，有許多都是起源於國內的失敗，而不是國外的失敗。我們處置國內種族關係與通貨膨脹的方式，以及我們在科技與國際收支方面的表現，無一不影响別人，也無不有助或有

害於我們的外交政策。

我們不能以內政應付無方，作為規避國際責任的藉口。許多評論家總說我們不自量力，想把世界改造到合乎我們的心意，結果我們費盡心力，既無益於己，亦無補於人。這種評論固然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想不到越戰，也許就有商榷的餘地了。史學家將來檢討這幾十年來的史實，其最訝異的地方，必然是美國竟能同心一意，由始至終慷慨地建立另一個跟本身同樣實力強大的聯邦。這在歷史上是尋不出前例的。這裏所指的，是美國在民主與共和兩黨前後五任總統之下，一直協助歐洲重建和歐洲團結的工作。沒有人說美國這樣做，是完全無私的，或者歐洲復興與達到空前團結的境地後，美國不會毫無好處。不過，翻遍外交史，都尋不出有那一國肯出力建立一個在經濟與軍事上成為自己對手的國家。

可是我們這樣做了。不管評論說什麼，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並不是對歐洲施使壓力，而是鼓勵他們的自發，把歐洲人所需的東西給他們，還在他們復興團結的過程中，保護他們，免他們遭受敵人侵害。我們的努力雖然只成功一半，但它的可貴處是不容抹煞的，它的終必成功，也是可以預期的。

批評家認為一切不對的事，都應該由美國負責，但看到對的事，則認為有沒有美國在，它們也會依着自然的法則而出現，非美國所能影響。批評家持取這種論調，已不是可異的現象。舉一個突出的例子。當代的英國小說家兼物理學者查爾斯·史諾在一九六〇年以科學界的權威和本身的聲望，支持當時的一項言論，說裁軍倘若不能實現，則「最多十年之內」，世界發生核子大禍，殆屬「定局」。他反覆把「定局」一詞說了四遍，以加強語氣。科學家有本身的紀律，所以不肯輕易使用這一類字眼。

的。因之，今天已是十年已過，而核戰得以避免，難道這不是我們的一項大成就嗎？有人說這只是幸運而已，可是奇就奇在國際間只有好事出現的時候，就認為是幸運，否則就絕口不提幸運。例如，批評家說：「我們能夠平安地解決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問題，真是幸運。」不過，假設美國政府發言人說出「我們在越南的運氣不好」這句話，一定被人怪聲噓下台，雖則事實確是如此。

還有人說我們在古巴危機發生的時候運氣好。那時蘇聯違反諾言，在古巴境內裝置攻擊性的飛彈。後來蘇總理赫魯曉夫同意撤走飛彈，於是有人認為赫魯曉夫有「政治家風度。」可是蘇聯國內上上下下，卻沒有一個人覺得撤走飛彈是富於政治風度的行為，而赫魯曉夫也因為這次事件而垮台。可是在美國方面呢，當時只見有人批評美國缺乏自制力，而無一人讚揚美國處理危機時的穩健與明智。我們應付柏林好幾次危機的時候，也是如此情形。每次我們都跟英法採一致行動，但行動的主張和行動的力量，則大部分出自我們。蘇聯靠恫嚇，企圖從西面把柏林封鎖，結果西方表示了保護柏林的決心，以最謹慎的行動，與之相持。當時我們挾着壓倒優勢的核子力量，但仍避免跟蘇聯對抗。我們沒有派坦克沿着德國快車道直搗柏林；我們只是派運輸機飛過蘇聯的路障，費盡空運的力量來援濟柏林。一個迷醉於本身武力的國家，是不會採取這種行動的。這種行動，是決心、想像力和自制力的混合表現。

畢爾德教授那篇文章尚未脫稿之前三年，我們已經答允讓菲律賓獨立，而且獨立的日子就迫在眉睫，後來因為發生二次世界大戰，才不得不延後實現。在那個時代來說，這是史無前例之事。我們從西班牙手裏把菲律賓奪過來，在我們的歷史上，並不是令人愉快的一樁事，但也絕不表示我們有帝國